

从南斯拉夫的桥到新闻记者的笔

□李 彬

1984年,广州。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,来到珠江之滨、黄埔之畔的暨南大学。时值改革开放初期,南国得风气之先,透着一片勃勃生机,就像风行的电影插曲《迎宾曲》抒发的:“花城百花开,花开朋友来……”对南来北往的淘金者而言,羊城自是风水宝地,而对读书人来说,这里同样风光旖旎,外版书、港台书更是迷人。

广州一年,读了一些书,也淘了一些书,特别难忘“一批”与“一部”。前者是给郑州大学新闻系购买的一批港台版专业书,这批当年的“宝贝”对笔者撰写《传播学引论》颇有参考,其中《大众传播理论》印象尤深,只是对作者李金铨一无所知。多年后,终于相识这位海外学者时,自然先把这段故事告诉他。至于“一部”,则是此次着重谈论的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。

这是一部驰名文坛的长篇小说,作者安德里奇

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,196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二战期间,他拒绝同德国法西斯合作,隐居贝尔格莱德,潜心写作,1945年完成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。1956年,他曾来中国参加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会,写下《鲁迅故居访问记》一文。

作为一个独立国家,南斯拉夫存在时间不足百年(1929-2003)。二战后重建的“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”,由6个共和国组成:塞尔维亚、克罗地亚、斯洛文尼亚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(波黑)、马其顿、黑山,而这些地区无不源远流长,历史悠久。1963年,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更名为“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”,简称“南联邦”。苏东解体,南联邦也经历变故,并组成“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”,即“南联盟”。南联盟战乱频仍,包括1998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,对其狂轰滥炸78天,其间美国军

已故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在甘惜分先生92岁寿诞时为他题诗:“大禹惜寸君惜分,满园桃李苦耕耘。舆论多少擎旗手,都是程门立雪人。”这既是赞美,又更像是英雄相惜的会意。这位传奇般的老者在周总理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的感召下一直在思索,是阅历让他深邃,又是忠诚令他简单;是岁月让他通融,又是执着令他倔强;是信仰让他无畏,又是虔诚令他谨慎。他在苦难中度过,却用坚守与追求写就了充盈饱满的人生。

(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《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,项目批准号:10CXW001)

参考文献:

[1]甘惜分.甘惜分文集[M].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2012.

(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,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)

【甘惜分简介】

甘惜分,我国著名新闻理论家,中国人民大学新

闻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邻水县。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,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。1939年调赴敌后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任高级干部学习班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。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入新华社任记者和编辑,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。

1954年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。1958年新闻专业合并,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,先后任副教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理论学刊《新闻学论集》主编等。1998年离休,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、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。

从教以来,主要致力于新闻学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,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,著有《新闻理论基础》《新闻论争三十年》《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》《甘惜分自选集》等,主编有《新闻学大辞典》,发表论文100多篇。

编校:张红玲

机悍然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,三枚导弹直接命中使馆大楼,犯下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闻的暴行,三位中国记者不幸蒙难——新华社记者邵云环、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与朱颖夫妇。2003年,南联盟改名塞尔维亚与黑山(简称“塞黑”),最终取消了“南斯拉夫”国号。

南斯拉夫所处的巴尔干半岛,素有“欧洲的火药桶”之称。这里是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合部,控扼地中海、黑海及印度洋的咽喉要道,战略位置十分突出,民族关系异常复杂,历史恩怨盘根错节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,即由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燃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在铁托领导下,英勇顽强,神出鬼没,给德寇以沉重打击与战略牵制,赢得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青睐。正因为此,南斯拉夫产生了一批经典的二战题材影片,如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,一度热播的电视剧《借枪》,片尾曲用的就是其主题曲,而电影《桥》的插曲《啊,朋友再见》更是风靡世界。看似巧合的是,这些影片多与一座大桥有关,这当然不是偶然的。

南斯拉夫中南部多为山地,高山峡谷,峭壁险峰,构成地形地貌的特征,也形成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天然屏障。由于这一地理风貌,桥也自然成为南斯拉夫的一大景观。在崇山峻岭间,在激流峡谷上,一座座凌空飞架的大桥既便利商旅交通,又构成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,而有关桥的故事、传说、奇闻等也同东正教传统一样,融入南斯拉夫的历史文化血脉。安德里奇在古城维舍格勒度过童年,他的家乡位于德里纳河畔,城郊的十一孔大石桥,曾给他以丰富的人生滋养,述说桥的瑰丽传奇与民间故事,在他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缤纷绚丽的精神烙印,半个世纪后终于汇成了一部“巴尔干人民的史诗”——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。

这部世界名著以一座大桥的兴废为线索,用20余万字篇幅,跌宕起伏、生动流畅地展现了一个民族

四五百年的风雨沧桑,追述了从16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,波斯尼亚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相继占领下的世事变幻、人事代谢,具有评论家称道的托尔斯泰“纪念碑式的风格”,古朴深沉,壮阔雄浑。小说的主角是大桥,主线是大桥,故事情节也无不围绕着大桥。这里,大桥好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,淡淡地、娓娓地讲述着一串串饱含眼泪、热血、辛酸、忧伤的往事:

大桥的存在及其伟大意义是永恒的……如同亘古不变的高山大河,始终如一。月亮圆了又弯,弯了又圆,人类也世代相传,繁衍不息,它却永葆青春,如同桥下流水年年如此。^{[1]70}

当我第一次读到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时,只觉潮起潮落,汹涌澎湃,千回百转,一泻汪洋。如此大开大合的历史,如此悲欢离合的人生,如此长歌当哭的情怀,都被作者编织为一幅徐徐展开、错落有致、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迷人画卷,让读者跟着他,时而沉浸于田园牧歌,时而屏息于狂风骤雨,时而昵昵儿女语,恩怨相尔汝,时而划然变轩昂,勇士赴敌场,铿铿锵锵而张弛有度,嘈嘈切切而丝丝入扣,仿佛黄河落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。不妨说说小说中的几个细节吧。

穆哈默德巴夏·苏格利,是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,“他指挥了在三大洲进行的多次战争,这些战争大多取得了胜利。他拓展了土耳其帝国的疆

界,对外保证了国家的安全,对内治理有方”^{[1]17-18}。他原是波斯尼亚人,生于德里纳河附近深山的一个村庄,1516年同一群塞尔维亚小孩作为“血贡”进奉帝国首都。所谓“血贡”,是奥斯曼土耳其实行的一种野蛮制度,在东南欧的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、希腊等地强征基督教男童,送往遥远的煊赫一时、威震天下的伊斯坦布尔,然后实施割礼,改宗伊斯兰教,长大后编入土耳其军队,回头镇压自己的父老乡亲。十来岁的穆哈默德巴夏同其他血贡一样,也改了名字、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俗,长大后还被擢升



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

为海军大将和丞相,成为苏丹的驸马。正是这位驸马爷建了德里纳河上的桥,因为幼年由此过河落下的一种怪病困扰他几十年:

他想到了根除这个痼疾的唯一办法:消灭那遥远的德里纳河上的渡口……在这条险恶的河流上架一座桥,沟通险峻的两岸,使被切断的大道成为通衢,从而把波斯尼亚和东方,他的出生地和他后来生活的地方,永远牢固地连接在一起。^{[1]18}

为了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,压制当地人的反抗,他派出心腹阿比达做监工。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,凶悍残暴,远近闻名。阿比达一到任,就召集当地官员与绅士训话,赤裸裸地、不加掩饰地、让人心惊肉跳地讲了一番“大实话”:

毫无疑问,在我来到之前,你们已经听到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蜚语。不用打听我也知道,那不可能是恭维话……总之,说我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恶棍。我现在要告诉诸位,这些话不是无中生有,也不是言过其实。我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好处可言。我干了多少年,唯丞相之命是从,才获得这样一个美名。我是奉命为修建这项工程而来的,我信仰真主,我也希望这项工程能够完成。一俟工程竣工,我就离开此地。我希望在我走之前,会有比你们已经听到的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话,从这里传播出去。^{[1]20}

果然,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,不久就发生了。为了杀一儆百,他将“抵抗运动”领袖拉底斯拉夫绑在桥头,当着全城百姓施以“桩刑”。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,在2001年的长篇之作《檀香刑》里写到的檀香刑,同安德里奇笔下的桩刑颇为相似,读来无不令人腿根发紧,毛发耸立,瞠目结舌,魂飞魄散:

一根约有四土耳其尺长的橡木木桩,削得很细,涂上了煤烟,尖尖的顶端包着铁头……一把木槌,是把木桩楔入犯人体用的……

三个茨冈人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,在他的每条小腿下方捆了一根绳子。两个茨冈人各执一根绳头,使劲向两边拉,把他的大腿分开。这时,麦尔强把那个木桩放在两根短圆木上,木桩的尖头对准他的胯下。随后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宽刃的短刀,跪在他身旁,俯下身去割破他的裤裆,把裂口撕得很大,好让木桩由此插入体内。

这一切都办完之后,麦尔强跳起来,在地上操起一把木槌,开始慢慢地、轻轻地捶打木桩的下端。每打一下,他就停一会儿,先看看木桩插入人体的情况,随后又看看那两个茨冈人,叫他们慢悠悠地拉着绳子,劲儿不要使得太猛。拉底斯拉夫的身体本能地

抽动起来;每打一槌,他的脊梁就往上弓起,但那两条绳子马上又把他的身子拉直。

这一切情景,河两岸的人只能听到一点声响,几乎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人们个个两腿发抖,面色煞白,手脚冰冷。

捶打后来停了一会儿,因为麦尔强发现犯人右肩胛骨上方的皮肤隆起,肌肉绷得很紧,他迅速走过去在隆起的地方用刀切开一个十字。一缕鲜红的血液从刀口流出,越流越多。他又轻轻地小心捶了两下,只见切口处露出了木桩的包铁尖头。他又捶了几下,木桩尖头便与右耳并齐了。

拉底斯拉夫受桩刑如同用烤叉串小羊,不同的是,这根叉的尖头不是从嘴里出来,而是从背上出来,所以对肠子、心脏和肺部都没有什么严重损伤。

他的心脏仍在微弱地跳动,肺部呼吸急促。^{[1]42-47}

如今,新媒体沸沸扬扬,新时尚扰扰攘攘,新闻领域的大融合、大数据、大变革也貌似此起彼伏,化用诗人昌耀的名句,这个世界“充满了神仙的说教,而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自然淳朴的歌谣”(原文“英特纳雄耐尔的歌谣”)。然而,无论世事如何白云苍狗,新闻学与新闻业终究离不开人间烟火,如马克思所谓“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”,如毛泽东为《大公报》题词“为人民服务”,或宋儒张载所言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等。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一等奖作品《皮里村蹲点日记》的记者何盈,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表达了类似心愿——“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”。换言之,新闻学与新闻业的根基是千万万年的“人文”,而非花里胡哨的“新潮”,认真的新闻、严肃的记者毕竟植根亿万人民的生活土壤,而不可能让“云计算”什么的弄得云里雾里,无根无蒂。所以,迄今为止的一切中外新闻大家,无不重视新闻的人生意味与人文蕴含,由此也无不注重文史哲的滋润与修养。

历史之于新闻在拙文《新闻与历史:且谈明朝那些事儿》里已有所涉及,而文学同样是滋养新闻人的精神源泉。可以说,新闻与文学也如一对孪生兄弟,无论历史起源,还是现实功能,都剪不断,理还乱。大略说来,一方面新闻与文学均属社会生活与人民心声的鲜活反映,一方面新闻与文学又无不通过叙事方式而呈现出来。美国的“新新闻”实践、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、《人民文学》近年开设的纪实专栏等,更是突出显示了新闻与文学的血脉相通、水乳交融。美国当代作家杜鲁门·卡波特的《冷血》以非虚构著称,无一处无来历,报道了一起血淋淋的凶杀案,而人物

形象之鲜明、故事情节之曲折、心理活动之真切,不亚于优秀的文学作品。《人民文学》发表文学博士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,同早年瞿秋白的《饿乡纪程》、夏衍的《包身工》、邹韬奋的《萍踪寄语》、范长江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等名作如出一辙,又都不输于地地道道的新闻作品。既然新闻与文学的内容与叙事无不相通,那么深切关注人世沧桑的记者,自然也就需要涉猎一些文学之作,从而既深刻体味丰富的社会蕴含,深入理解怅望千秋、萧条异代的人生况味,又可获得诸多借鉴,以改进完善新闻报道,包括简练、准确、生动等笔法。几年前,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推行了毕业生(本科生与研究生)以新闻作品代学术论文的改革,2013年两会期间俞正声向湖北代表团推荐的《农民中国》(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2)即为这一改革实践的成果之一。在指导本科生、研究生采写新闻作品时,我们也常提醒学生,除实地采访、研读新闻范本、向各路新闻记者学习之外,优秀的文学作品对知人论世与谋篇布局也同样不可或缺,甚至更有意义与启迪。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在讲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时提到的一点,也无异于同样揭示了新闻记者的“铁肩担道义,辣手著文章”:

几百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,当人类社会的黑暗和光明持续斗争的时候,文学站在黑暗一边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,不是说没有,但很少,在大多数时候,文学都是站在受欺负的弱势者一面的,站在追求正义和公正的社会未来这一边。譬如对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抗议,文学都是最早的参与者。^{[2]4-5}

还以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为例,看看文学的知人论世与谋篇布局。安德里奇是位颇具哲思的作家,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洞明不仅闪现于字里行间的佳言懿语,而且更融汇于“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”的深沉叙事。前者如“治好人们精神上的创伤,最好的办法是忘记过去,而要做到这一点,只有歌声最有效,因为歌声一起,便会把人们带到美好的境界中去”;“没有公开暴乱和试图推翻它的地下活动,一个政权也就不成其为政权了,正如一个人在生意上如果不受挫折,总是一帆风顺,那他也不会成不了富翁”;“他竭力说明一个人主要不是在乎走得快,问题在于到哪里去,去做什么,因此快并不一定就是好。‘如果你是上地狱去,那还不如慢一点好’”;“土耳其人说得好,有三件事是无法隐瞒的,这就是谈情说爱、咳嗽和生活劳苦”……^{[1]82-83,248,294}至于后者,如下一段几近白描的文字对现代化与现

代性的审视与反思,相较学界一些云山雾罩的高谈阔论不是更有启发吗:

这些外国人一刻都不闲着,也不让别人闲着。好像他们决心要用一套法律、规章和命令无形之中但又越来越明显地把整个生活,包括人、畜和物全部束缚住,而且要把他们周围的一切——市容、风俗、习惯等,从摇篮到坟墓,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他们对这一切不慌不忙地在进行,不说空话,不用暴力,也不强迫,因此谁也没有理由反对他们。如果他们偶然遇到有人不理解,或者遇到一些阻力,他们就立刻停下来,暗中进行磋商,只是把他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加以修改,但总的决定还是不变,照样进行到底。他们所做的一切看来都是毫无意义,甚至是荒诞的,例如丈量一些荒芜的土地,把森林里一些树木标上记号,检查粪坑和阴沟,检查牛马的牙齿,审核度量衡,调查人民所患的疾病、果树的数量和名称、母羊和家禽的种类等。他们简直是在闹着玩,在当地居民的眼里,这些事情简直不可理解,毫无意义,徒劳无用。他们那样热情专注地进行的这一切事情,忽然不了了之,也没有留下一点踪迹,似乎已经彻底消灭了。但是几个月以后,往往是整整过了一年以后,人们已经把这些事情完全忘了,这时候,人们早已遗忘,表面上毫无意义的那些措施突然又有了下文。各区长被召集到市政府,聆听各种新颁发的命令,这些命令牵涉到砍伐树木,消灭伤寒,经营水果、糕点或有关牲畜通行证等等规定。每天都有一种新的规定,而且每颁发一种规章,大家不是感到个人的自由受得了部分的限制,就是感到个人应承担的义务增加了;另一方面整个城市、所有乡村和全体居民的生活领域开阔了,范围越来越扩大了。^{[1]149-150}

作为典型的叙事文本,文学作品的谋篇布局及遣词用语,则因人而异,举不胜举。这里仅谈一点,即可略见一斑。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开篇就围绕建桥展开,写到丞相造桥缘由、亲信暴戾恣睢、民众顽强反抗等情节。当美轮美奂的大桥终于赫然展现,人们奔走相告时,这一场景也落下帷幕。下一章一开始,作者仅用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句子——“一百年过去了”,便一下移到下个百年,举重若轻,不着痕迹:

这一百年不能算短,这期间,人类几经沧桑,许多建筑物已不复存在,但设计考究、基础牢固的大型建筑物却没有什麼变化,大桥、加比亚台和附近的旅舍仍旧屹立在那里,雄姿不减当年。看来,随着四季循环不已,人类繁衍不息,这两座建筑物还会安然无恙地度过第二个一百年。但意想不到的是,

遥远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却起到了漫长岁月所起不到的作用。^{[1]70-71}

于是,由此展开新一轮的叙事,开始讲述“遥远地方所发生的事件”。就这样,大桥的故事移步换形,淡出淡入,直至1914年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随着一声轰然巨响,德里纳河上的桥也化为瓦砾,象征着文明就此陨落。从那时到现在,又过去整整一百年了,而这一百年人类世界更是跌宕起伏,惊涛裂岸……

我们知道,南斯拉夫与新中国颇多相似与相关。冷战时期,铁托与毛泽东都不怕鬼,不信邪,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,奉行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,不依附于、屈从于任何强权势力。同时,又着眼世界,胸怀天下,具有一种共产主义情怀下的国际主义视野,铁托倡导的“不结盟运动”,毛泽东提出的“三个世界”理论以及广泛声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,均对世界格局产生战略性、全局性的影响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“国际新闻新秩序”浪潮,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并依托于不结盟运动而风起云涌、风云激荡,最终产生世界新闻传播史上的里程碑文献—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《多种声音,一个世界》,对西方一手遮天的新闻格局第一次形成全面冲击。当此时,为了破除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围堵与遏制以及后来苏联的霸权主义,中国人民在毛主席、共产党的领导下,坚毅卓绝,众志成城,折冲樽俎,远交近攻,最终迎来70年代地缘政治的崭新局面。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、“跨越太平洋的握手”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”、日本以及一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、为改革开放剪彩的“四三方案”等,无不标志着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。与此相应,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为了深入了解世界,特别是让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知己知彼,国家还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所谓“皮书”,包括灰皮书、黄皮书、白皮书。其中200余种人文社科图书,囊括今天流行的《1984》《古拉格群岛》《通往奴役之路》等“名作”,涉及考茨基、伯恩斯坦、托洛斯基、萨特、哈耶克,以及铁托的战友而后来分道扬镳的吉拉斯及其《新阶级》。韩少功在2013年出版的小说《日夜书》里,还以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一对“胸怀祖国、放眼世界”的知青互不服气的斗嘴提及《新阶级》,活灵活现,忍俊不禁:

“你们读过《斯巴达克斯》?”

“哎呀呀,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吧?”

“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《新阶级》?”

“也就看两三遍吧,不是太熟。”

“说说《资本论》吧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请问是哪个版本?是人民版,还是三联版?还是中译局的内部译本?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,不要说乱了。”

“你们知道谁是索尔仁尼琴?”

“你是说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还是《马特辽娜的家》?你要是想听,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。”

“那……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《1984》?”
……^[3]

1984年,我在暨南大学跟随名作《光荣与梦想》的译者梁洪浩先生研修世界新闻史。有一天,去北京路书店,无意间发现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。那时孤陋寡闻,既不解这部名著,更不知安德里奇,八成为了“特价”将其淘入书囊。后来,又无意间翻开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,才一下被其有声有色的故事与叙事所吸引,一气读完,心潮翻涌。除了内心的感触与精神的淘洗,书中最后那段天问般的人物独白,还被引入2005年付梓的拙著《全球新闻传播史》:

这些邪恶的异教徒对任何东西都进行整顿,清扫,维修,改善,然后又都毁于一旦,他们也许会扩展到全世界;他们疯狂建设,又疯狂破坏,也许会把真主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弄成杳无人烟的荒野,或者变成一个放牧场,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和无法理解的食欲吧?一切都是可能的,不过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:那些英明伟大、灵魂高尚的人物,为了真主的荣耀,创建了一些千古长存的建筑物,使大地变得更加壮丽,使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美好,这样的人物将与天地日月共长存。如果这样的人物也完全消逝,那就等于世界上对真主的爱已经完全消失殆尽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^{[1]380-381}

[南斯拉夫]安德里奇.德里纳河上的桥[M].周文燕,等,译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9.

[捷克]哈谢克.好兵帅克历险记[M].星灿,译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3.

[塞尔维亚]帕维奇.哈扎尔辞典[M].南山,等,译.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1998.

参考文献:

[1]伊沃·安德里奇.德里纳河上的桥[M].周文燕,等,译.王少恩,等,校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9.

[2]毛尖,编.巨大的灵魂战栗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3:4-5.

[3]韩少功.日夜书[M].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3:98.

(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)

编校:张红玲